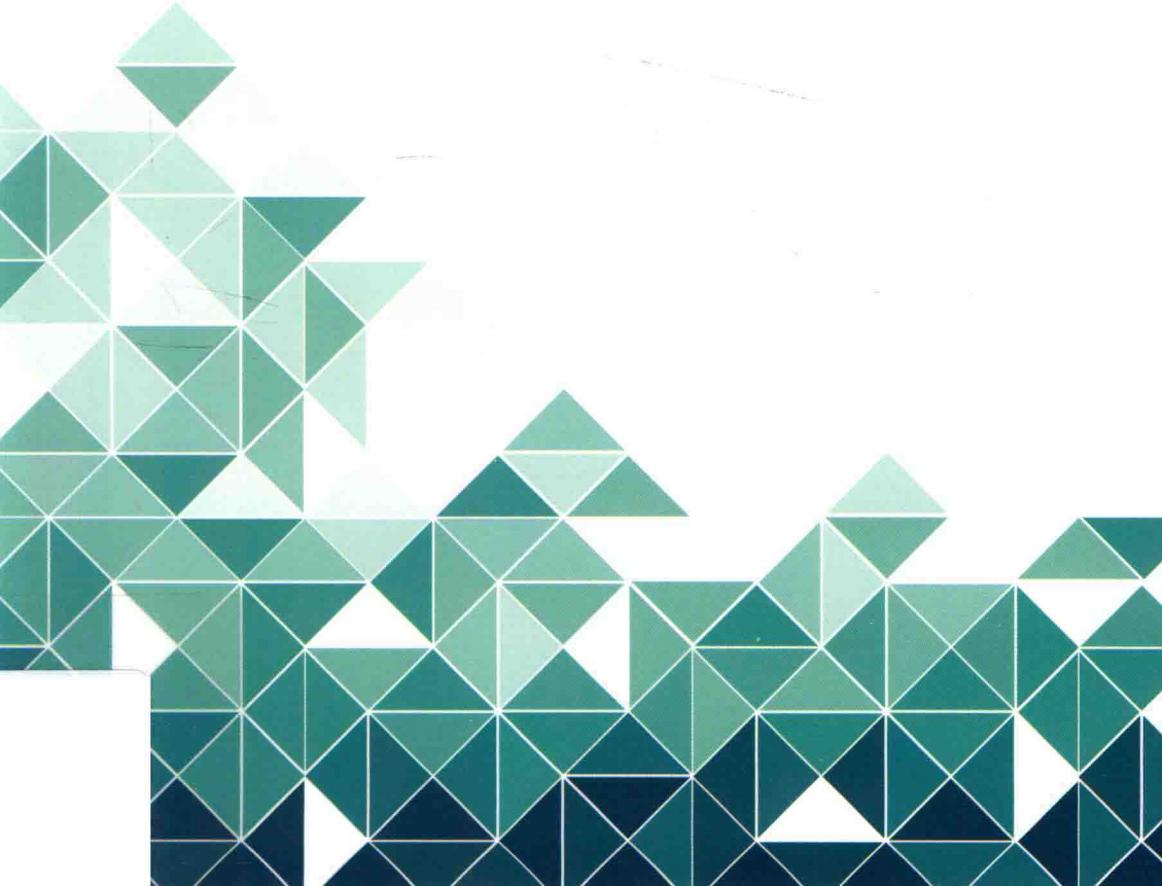


中國外交戰略 傳統及其變遷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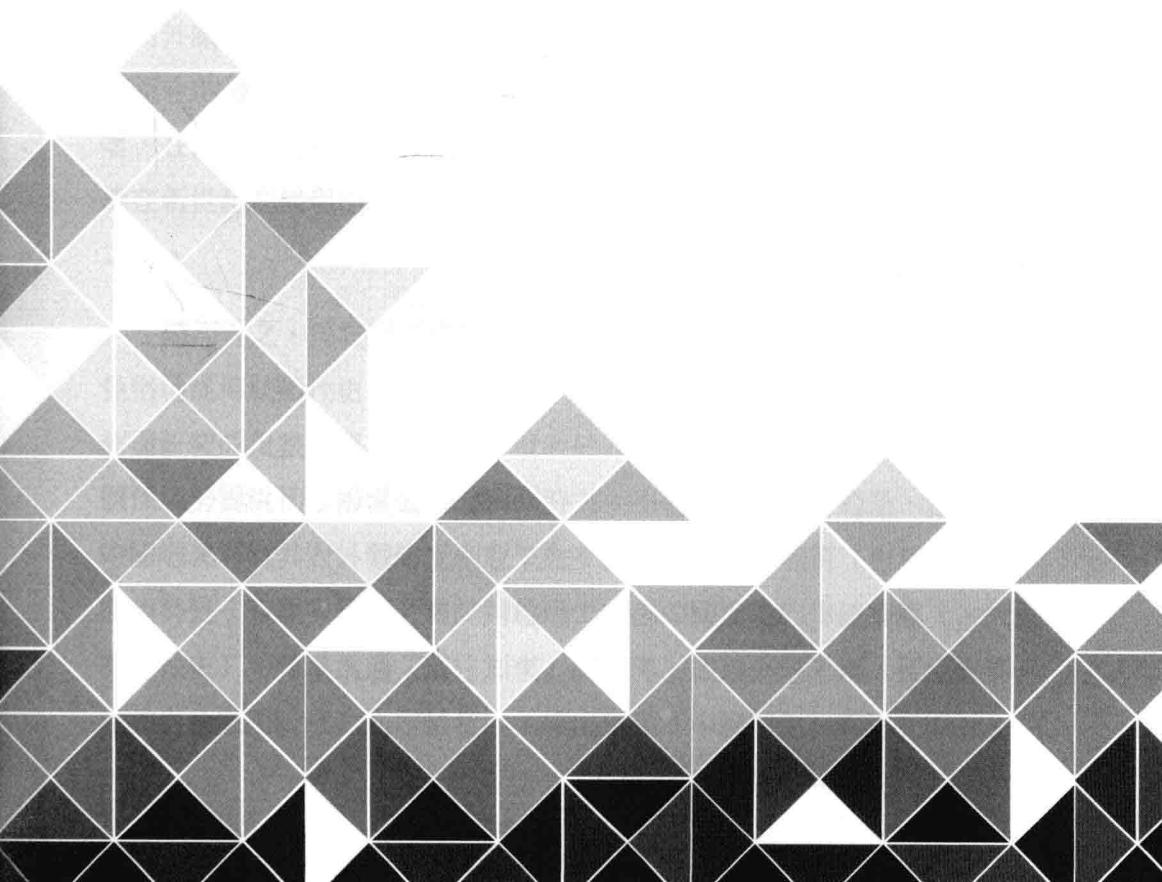
蔡東杰 ★ 著



中國外交戰略 傳統及其變遷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蔡東杰 ★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外交戰略：傳統及其變遷／蔡東杰著。

——初版。——臺北市：五南，2013.09

面；公分

ISBN 978-957-11-7293-4 (平裝)

1. 外交政策 2. 國家戰略 3. 中國

574.18

102016792



1PX9

中國外交戰略：傳統及其變遷

作 者 — 蔡東杰 (367.2)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王翠華

主 編 — 劉靜芬

責任編輯 — 蔡惠芝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300元

自序

首先，處於「大轉變」分界點之清季以來的中國對外關係，一直是個人長期的研究興趣之一；對此，除在2000年出版《中國外交史》以便初步勾勒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中國對外互動發展（2010年重新補充編寫，並改稱《中國外交史新論》），並於2001年重新增刪付梓《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一書外，同年又針對兩岸分裂以來的外交歷程，出版《兩岸外交策略與對外關係》，由導致分裂變局的國共對立背景論起，然後將兩岸自1949年迄今的發展演變歷程，從七個不同歷史時期角度，分別加以論述。接著，在2008年所撰寫的《當代中國外交政策》（2011年再版），則試圖回應在新世紀初展現出更多變化與可能性的國際體系格局，探討中國的因應之道。

總而言之，為釐清近代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走向，個人一方面既不可免俗地從傳統斷代史（清末、民國、兩岸分治）角度切入，陸續將近來觀察與研究成果整理累積出書，以就教於同行先進，並期盼對未來中國對外關係趨勢提供初步撥雲去霧的預測努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由於中國崛起導致其對外戰略受到愈來愈多關注同時，一個新（也是理應有）的趨勢是，有更多研究者嘗試跨越過去切割中國歷史的傳統藩籬（古代史與近代史），希望透過「鑑往知來」的思考，從過去兩千年（甚至更早，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經驗當中，尋出更具「中國特色」的研究導引，從

而累積了不少成果。至於本書，也可以算是個人在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嘗試性作品。無論如何，本書雖試著進行重構中國歷史的工作，並將焦點放在中國如何建立自我認知，並依此判斷並決定其對外行動方針上，但前述重構過程中更重要的挑戰並不在切入角度的選擇，而是如何將傳統王朝史（舊中國）與近代史（新中國）在邏輯上銜接起來，以整理出連繫兩個歷史階段的接合點，並由此將焦點拉到二十世紀末，經由釐清「中國崛起」相關概念以預視其未來發展。

在本書撰寫與後續修訂期間，除了要感謝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同仁們之間的融洽氣氛，提供了研究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良好環境外，其次則要感謝在過去十餘年來在所上修習過個人所開設「兩岸外交政策比較研究」課程的同學，所帶來教學相長之刺激與自我鞭策的動力，再者也要感謝五南圖書公司編輯同仁的費心處理本書出版事宜，最後更要感謝內人璐萍與愛女佾宸，如果沒有他們的充分體諒，本書亦沒有順利付梓的可能。無論如何，本書之目的僅在拋磚引玉，希望各方專家能不吝賜正，俾利後續再行修改。

蔡東杰 謹識

2013年8月於台中抱樸齋

目 錄

緒 論	001
第一節 研究中國外交之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001
第二節 本書結構與段落安排	007
第一章 背景：漫長的再崛起之路	011
第一節 前帝國時期的中國外交	011
第二節 第一帝國與中心觀的形成	018
第三節 文明融合與第二帝國	026
第四節 地緣環境變遷下的第三帝國	031
第五節 近代涉外關係與後帝國格局	038
第二章 傳統：現實的建構主義	043
第一節 中心觀與華夷思想的建構	043
第二節 朝貢機制之演進與運作	051
第三節 中國中心體系的現實與虛構	061

第三章 前提：先安內再攘外	067
第一節 規模性政治壓力與危機	067
第二節 分權式結構的必然性與問題	078
第三節 對外擴張與體系建構	085
第四章 特色：中國式戰略觀及其作為	093
第一節 中國棋盤與佈局邏輯	093
第二節 以威望為主的政策反饋設定	102
第三節 羣獮與和戰策略交叉運用	107
第五章 挑戰：大轉型後的內外部結構內涵	115
第一節 工業與資本主義文明衝擊	115
第二節 國際結構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	123
第三節 新思潮引導之結構轉型	133
第六章 趨勢：持續變遷中的中國與世界互動	141
第一節 歷史演化之起承轉合	141
第二節 中國崛起的背景與發展	152
第三節 中國特色成分與崛起之潛在影響剖析	163

第七章 現狀：當前中國之戰略佈局 與外交作為

171

第一節 現狀政策路線及其發展	171
第二節 帝國化政策軌跡與潛在趨勢	180
第三節 下階段中國外交戰略主要熱點	192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中國外交之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在國際政治史上，所謂強權（great power）或霸權（hegemony）國家的存在雖是相當普遍且自然的，但這類說法通常並不僅是用以「描述性」地說明國家間權力差距而已，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某種「操作性」暗示；進一步來說，多數強權與霸權國家都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積極且慣常之介入性角色，並經常設法制裁或控制那些潛在的秩序破壞者。¹ 當然，從權力差距及其暗示來看，前述由強權國家所進行的制裁或控制過程，多半應當以成功收場，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由於潛在秩序破壞者（或權力挑戰者）所具備之能量有時確實難以壓抑，結果便不斷帶來在國際政治中的興衰循環（cycle of rise and fall），也成為多數人觀察歷史演進的焦點所在。

一、世界秩序變遷與霸權轉移之可能性

隨著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末爆發，原先處於全球地緣政治邊緣的歐洲，於是在擴張「慾望」外，首度獲得實際的擴張「力量」，其結果是「歐洲經濟突破了它在漫長十六世紀所創造的疆界，開始將巨大的新

¹ 部分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學者似乎較重視霸權對國際「經濟」秩序而非「政治」秩序的維持；see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9,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1967-1977,"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 131-162.

地帶併入它所包含的有效帶動分工中」，² 從而使全球性世界體系有機會跟著建立起來。值得一提的是，自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的國際體系其實是分成兩個世界來運作的：首先在歐洲所存在並被稱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平行性互動模式，其中英國只不過是個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強權國家而已；³ 至於在歐洲國家相對於世界其他區域的階層性關係上，則幾個重要殖民國家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都不啻可說是霸權國家；當然，英國是其中力量最強大的一個「霸權」（one of the hegemons）。⁴

進言之，相較於過去習慣從純粹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政治角度來觀察國際關係演進，特別是針對歐洲霸權時期的大國興衰問題，近期以來，權力轉移理論（power-transition theory）似乎提供了某種更具解釋力的角度，⁵ 其不同處在於，相較於傳統理論經常不由自主地假設國際結構是靜態存在的，後者則更重視國際內涵變遷的動態性。此派觀點認為，在既存結構中，霸權地位的更迭既很難不是由國際衝突導致之結果，至於爆發國際衝突的原因又不外乎是國家間權力對比出現均衡（parity）或超越（overtaking）現象所致，⁶ 前者是指後進或潛在挑戰者的權力值逐

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p. 129. 以第一個可被稱為「全球性」霸權國家的大英帝國為例，其殖民擴張雖可遠溯至十七與十八世紀時，但因政經結構未完成調整，因此直到十九世紀初才確實奠定它在歐洲或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這裡是指英國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完成之經濟（工業革命）與政治（憲章運動）的雙重革命；see W. A. Speck, *A Cambridge Concise History of Britain, 1707-19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 3.

3 例如 Kennedy 便強調，由於太過宣揚軍隊的非生產性，因此「在維多利亞女王中期，儘管英國經濟成就輝煌，卻可能是自斯圖亞特王朝以來對戰爭最缺乏動員的時期」；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188.

4 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 et al.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Chapter 3.

5 該理論其實最早由 A.F. Organski 在其所著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一書中所提出，與傳統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比較起來，該理論認為權力很難被真正地平衡，因此不斷地權力衝突乃是理解重點。

6 See A.F.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Manus Midlarsky,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and Jacek Kugler,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 2000).

漸拉近與領先者或霸權間距離，亦即挑戰者完成了「追趕」政策（通常暗示經由經濟成長以致提升軍備與政治影響力），⁷ 至於超越則是指潛在挑戰者不僅有效拉近與領先者或霸權間權力差距，甚至透過某種躍進式發展，導致其能力還凌駕於霸權之上。⁸ 其次，權力轉移與傳統理論的差異還在於，它假定國際經濟關係與政治權力關係其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決策者有關合作或競爭的抉擇，往往也引導著政治與經濟的互動；⁹ 由此將經濟考量加入國際政治行為後，一方面強權國家可能使用貿易政策來轉變不滿意國家的喜好（例如美國在 1947 年建立布萊頓森林體系或在 1980 年代後普遍利用 301 條款），也傾向頻繁地使用經濟制裁來對付不滿意國家，最後，為避免出現前述「均衡」或「超越」現象，多數霸權都會限制關鍵技術流向對手國家（潛在挑戰者）。總而言之，特定國家經濟擴張將帶來國際結構重塑的效果，而結構內涵的改變與權力重新分配，則會增加衝突爆發的潛在可能性。¹⁰

可以這麼說，儘管有關霸權理論的相關學術討論未必針對美國而來，但作為現任霸權，也是最重要的個案研究對象，美國的霸權歷程既受到普遍關注，其未來也是目前相關理論之研究焦點所在。

正如眾所周知，由於與歐洲具備高度文化聯繫性、快速的工業發展、相對於其他區域與歐洲更密切的地理鄰接性、自獨立後逐漸形成的社會特徵，以及未受到兩次大戰波及等諸多原因，美國自二十世紀初起便慢慢躋

⁷ Moses Abramovitz, *Thinking about Grow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20-242.

⁸ Elise S. Brezis, Paul R. Krugman, and Daniel Tsiddon,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5 (1993), pp. 1211-1219.

⁹ See Jacek Kugler,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 Chapter 5.

¹⁰ Kalevi J. Holsti 也認為在 1648-1815 年間，至少從數量上看來，經濟問題及其爭議愈來愈成為歐洲國際戰爭的主要根源，見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15.

身成為與歐洲並駕齊驅的強權行列，¹¹ 甚至在第二次大戰後還一舉「超越」舊核心歐洲，躍升為被稱為「超級強權」（superpower）的全球性霸權國家。由於曾經同時擁有具壓倒性的軍事（核子技術與全球性投射力量）與經濟（占全球工業產值大半並擁有全球最大黃金儲量）等絕對優勢，美國的強大在 1950 年代確實無庸置疑，但從歷史經驗看來，任何霸權國家都很難恆久維持下去，美國也是如此。¹² 例如在 1970 年代後，由於與蘇聯進行大規模軍備競賽並進行全球性結盟競賽的關係，致使其消耗掉相當大的經濟能量，¹³ 尼克森主義（Nixonism）所強調「有限介入」與「區域合作」等退縮策略，更突顯出美國霸權的力有未逮；儘管在蘇聯崩解後，它一度「……就像跨坐在地球上的巨人，主宰著商業、貿易與運輸等領域，經濟可說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軍事力量也無人能及」，¹⁴ 小布希政府的「先發制人」政策亦似乎充分象徵著美國擁有的相對優勢，¹⁵ 但美國不再依賴外交手段、援助與國際法，而是透過軍事力量、威脅恫嚇與金融機制來貫徹外交政策的趨勢，既引發來自全球的反彈聲浪，讓奈伊（Joseph Nye）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此一新名詞來提醒美國政府，¹⁶ 至於 2003 年至 2010 年在伊拉克戰爭中虛擲的大量資源，以及 2008 年由於次級房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更使美國經濟面臨大幅

¹¹ Robert D. Schulzinger, *U.S. Diplomacy since 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9-37.

¹² A.F.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Manus Midlarsky,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see also 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1987), pp. 288-296.

¹³ See George Modelska, *Exploring Long Cycle*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87) and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¹⁴ "America's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23, 1999, p. 15.

¹⁵ See Stephen W.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¹⁶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 (1990), pp. 177-192;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1990), pp. 153-171.

萎縮的窘境，並埋下了國際格局遽變的伏筆。

二、當前中國能量特色及其發展評估

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預估的：「單一超強的世界將不會持續下去；在未來二十年當中，中國不但人口將達到 15 億，其強勁的經濟成長與依然帶有威權取向的政府，也必然會繼續推進其利益，……至於當某個人帶領後葉爾辛時代的俄羅斯向前邁進後，另一個全球影響力的競爭者也將再度出現。」¹⁷ 無論此種推斷的臆測性質有多高，但「霸權興衰」既是無可避免，也是必須接受的歷史邏輯，在既有霸權格局存在變動可能性時，嘗試對未來發展進行推估，也是相當自然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蘇聯解體與冷戰落幕，自十九世紀末形成的這個（東亞）區域體系，首度出現一群國家和另一群國家間沒有被分割的現象。……中國不必在到處是衝突的背景中考慮國防問題，首度可以同時和所有國家相交，……經濟影響力與軍事力量日益強盛的中國，可以在塑造其周遭環境時，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¹⁸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中國也認為自己「正在世界的東方崛起」，國際上對中國未來的樂觀評估也頗有自，包括改革開放後 30 年間高達兩位數的奇蹟式平均成長率，以及它力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政治結構調整等事實，都使觀察家們提醒中國將成為新權力競爭者的趨勢。¹⁹

總的來說，經濟成就乃是當前中國地位與能量的象徵。正如趨勢專家大前研一所言：「……最近幾十年間，全球政治家、經濟學者與投資家

¹⁷ "When the Snarling's Over," *The Economist*, March 13, 1999, p. 17.

¹⁸ Robert Pastor 編，《二十世紀之旅：七大強權如何塑造二十世紀》(台北：聯經文化公司，2000 年)，頁 334。

¹⁹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1999), pp. 29-32.

一面祈禱中國繼續沉睡下去，一面又承認中國的潛在實力並預測中國即將覺醒，扮演世界經濟原動力的角色。」²⁰ 不可諱言地，中國連續 30 年的快速增長，此一成就可說無愧於「奇蹟」稱號；以此為基礎，至少就可見的歷史記憶（近百年來的發展頓挫）與正常的國家利益考量而言，對中國領導者來說，他們很難不希望利用這個契機來提升國家安全度，甚至取得更高的地位與影響力；其中，根據綜合國力重量不重質的思考漸占上風，所謂的「大國論」既逐步成型，經濟實力也成為中國最不容忽視的軟軍備。在後冷戰環境與中國本身發展所提供的複雜背景下，中國應付挑戰的一套邏輯是：首先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後，逐步確立將推動（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提高綜合國力的長期方針；²¹ 其次，認定由於美國不可能鞏固其單邊主義政策，因此世界新格局不僅將朝權力分散特徵邁進，此種多極化的結果也將為中國提供有利於改善其國際地位的「機遇期」；²² 最後，無論中國將如何利用前述所謂機遇期，更重要是，中國應決定如何透過更寬廣的視野，運用當前的國際環境與國力要素以徹底扭轉百餘年來的歷史發展困境。

在此必須一提的是，無論中國是否真的可能崛起，一旦它有機會成為霸權的話，如何觀察並預測其崛起特徵便顯得相當關鍵，例如從「崛起一大國崛起—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發展—和諧世界」等一連串國際宣傳主題內涵變遷可見，中國確實不斷地試圖去尋找出能被多數人接受的形象。其次，中國的崛起還必須有以下條件配合：首先是符合權力轉移理論有關均衡與追趕的假設，亦即實質縮小與既存霸權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其次是擁有可填補的權力真空地帶，亦即能否成功地將東亞地區作為其依

20 大前研一，《中國，出租中》(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2 年)，頁 20。

21 參考吳敬璣，《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台北：麥格羅希爾文化事業，2005 年)，第二章。

22 陳佩堯與夏立平主編，《新世紀機遇期與中國國際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徐堅主編，《國際環境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托基礎；第三是能否有效地使用武力來展示並奠定國際地位，並避免因此被拖入不必要的戰爭泥沼；²³ 最後則是能否擬定擁有長期發展前景的「大戰略」，而非目的僅在於追趕的「大國戰略」。

在本書當中，主要關切對象便在於此一即將浮現的「大戰略」之可能內涵。可以這麼說，相較於客觀層面的國際結構內涵條件，國家的外交戰略無疑具備較為主觀的特徵；換言之，此一戰略設定既必須符合自身發展利益（也就是為自己的需求量身訂做），也不可能無視於相關決定之歷史經驗（亦即過去類似之戰略設定及其實踐結果）。尤其對曾擁有悠久文明傳統，甚至某種霸權經驗的中國而言，當然，為因應時勢變遷帶來的新挑戰，完全複製傳統模式是不可能的，但過去的傳統思考與作法也不可能對當前毫無影響。正因如此，相較於多數討論中國外交的學術論著，主要將焦點放在當前中共政權之可能因應作法上，本書則試圖透過更長遠的歷史追溯路徑，希望從中找出理解未來中國外交戰略走向之不同思路。

第二節 本書結構與段落安排

根據前述邏輯與想法，除了作為緒論的本章之外，本書共分為七章來逐步進行討論。首先在第一章當中，個人希望打破過去「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傳統藩籬，一方面以「三大帝國時期」的歷史架構來重新組織中國的對外關係發展，並追尋一個「客觀存在的中國」，藉此作為歸納其主要認知內涵與行為模式，以及觀察其漫長之「再崛起」（re-rising）歷程

²³ 儘管中國企圖以二次戰後的德國與日本為例，來說明「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見夏立平與江西元，《中國和平崛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二章；但此種引喻既不甚恰當，事實上部分學者也不否認因崛起的「零和性」及其衝突暗示，見閻學通與孫學峰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頁2-7。

的基礎。接著，再簡略地重新勾勒中國過去兩千餘年來的發展脈絡，並透過國家形式變遷與體系架構內涵等角度，引導大家瞭解中國在面對周邊環境挑戰時之相應對策後，第二章則將焦點轉往政策制定的心理邏輯基礎，亦即針對所謂「天朝觀念」之內在意涵進行討論；由此，本章首先提出「現實建構主義」的修正性概念作為理論指引，接著則鎖定天朝觀念最主要的制度形式，亦即朝貢體制加以批判論證，期盼能在「解構」部分不切實際且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之後，「建構」出對未來中國外交更確實的分析角度。

正如眾所周知，政策的理性程度有賴於「政策目標」與「實際能力」之間的有效維持平衡。以中國傳統外交戰略為例，重建帝國政治架構並恢復天朝上國威望，固然是許多執政者（尤其是王朝創建者）夢寐以求的目標，但在邁向目標的過程中仍需要不斷地進行理性評估。更何況，正所謂「外交乃內政之延長」，因此，瞭解中國進行內部統治時所面對之各種挑戰，此類挑戰對於對外政策內涵之影響，以及中國在面對此類挑戰時所慣常出現的思考與反應，既是分析中國對外政策時無可迴避的基本點，也是第三章的重點所在。至於在第四章中，本書則轉而注意另一個關鍵處，亦即理解工具的問題：究竟我們應繼續使用西方理論邏輯來解析中國歷史發展，還是必要但有限地加入部分「具中國特色」的想法？儘管個人並不否認某些普遍性概念確實存在，但事實證明，不同群體仍可能衍生出具有相對獨特性的行為規範，中國自然亦是如此。對此，本章將維持前一章從內政出發的觀察角度，討論「具中國特色之戰略觀」的焦點內涵所在。

無論如何，本書雖嘗試進行重構中國歷史的工作，並將焦點放在中國如何建立自我認知，並依此判斷並決定其對外行動方針上，但前述重構過程中更重要的挑戰並不在切入角度的選擇，而是如何將傳統王朝史（舊中國）與近代史（新中國）在邏輯上銜接起來；對此，第五章首先從「大轉

型」角度出發，然後設法由中國面對挑戰時所選擇的回應途徑，整理出連結兩個歷史階段的接合點。接著在第六章當中，則設法再度透過回顧性的探討，希望藉由「客觀」與「自省」所提供的理性，脫離「中國中心」傳統且危險的主觀論點，以便更清楚地檢視中國決策者的心靈背景與治理過程，並將焦點拉到二十世紀，經由釐清「中國崛起」相關概念以預視其未來發展。

最後，與其將第七章視為「結論」，面對所謂「後美國時代」開始成為被討論新焦點之輿論現實，本書更期盼將它作為觀察未來中國外交戰略走向的「起點」。伴隨著「金磚四國」悄悄崛起，對於國際政經板塊變遷所帶來的拉動與推移效應，尤其中國企圖努力貫徹「走出去」戰略以掌握此一「戰略機遇期」的具體外交作為，對此，當前中國的外交目標究竟將如何設定，未來又可能朝哪個方向前進，不僅是本章關切的重點所在，更是本書從一開始便希望加以勾勒的思考藍圖。